



FOCUS

高层动态

2020年7月6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88.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最新动向	3
【习近平：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扭住关键鼓励探索突出实效】	3
【李克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努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4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5
【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6
【韩正：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9
【郭声琨：提升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水平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9
问题探射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风险和制约】	10
【外债合意规模之“扩”与局部风险之“防”】	16
【国民经济诸多问题的总症结是土地体制扭曲】	19
人物关注	21
【省部级干部调整，程福波任陕西省副省长】	21
智囊高参	23
【邢自强：全球经济将呈现 V 型复苏，三大改革助力中国经济】	23
【吴金铎：中国消费的韧性和弹性】	26
虎视寰球	32
【法国更换总理背后玄机几何】	32
【G7 扩容矛盾加剧韩日紧张关系】	33
【欧美分歧呈现“加速度”】	35
华夏透视	36
【新基建如何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36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习近平：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扭住关键鼓励探索突出实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出席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有企业勇挑重担，在应急保供、医疗支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3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健全法律法规，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会议指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



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权益。

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会议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会议强调，国有文艺院团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导，以演出为中心环节，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生机活力，创作生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佳作，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着力增强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整体效能，优化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动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络，患者就医负担逐步减轻，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医药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强化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要梳理各地深化医改情况，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加快推进健全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医防协同机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完善相关配套支撑政策，打好改革组合拳。要高度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重塑医药卫生管理和服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对近期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要抓紧从体制机制上想办法、补漏洞，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改革任务的落实同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有针对性地部署推进关键性改革。要提前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工作，更加注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对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和引导，让新生事物健康成长，让发展新动能加速壮大。

[Top](#)

【李克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努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胡春华、刘鹤、王毅、肖捷、何立峰参加会议。

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汇报了当前外贸形势和下一步工作考虑。格兰仕、



东方国际、东软集团、好事达、执御信息、嘉逸志友等企业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结合各自所在的家电、服装、医疗设备、家具、跨境电商平台、摩托车等领域谈了企业生产经营和进出口情况。李克强详细了解企业订单、用工、资金、产业链供应链等，询问对下一步市场形势的看法和对国家政策的建议。他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反映的问题和建议，采取措施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李克强说，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稳定经济运行和就业大局至关重要。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近几个月外贸有所回稳。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下一步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有充分估计和准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六稳”“六保”，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困难挑战，着力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外贸方式，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为保就业稳经济提供支撑。

李克强指出，要按照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要求，抓紧抓实抓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研究出台稳外贸稳外资的新措施，尤其要加大支持力度保住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并助力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破解难题，更好支撑就业稳定。完善出口退税方式，加快退税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信贷、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纾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继续挖掘通关便利化改革潜力，优化对外贸企业服务。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加强与相关国家沟通协调，畅通国际货运通道，开辟更多方便商务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鼓励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网上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引导多元投入建设海外仓，加大对带动中小企业出口的外贸服务平台的支持，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完善稳外贸稳外资相关措施。

李克强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出更多扩大开放的举措，推动多领域多层次国际合作，在不断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开放，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鼓励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让中国成为更多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增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下更大功夫。

[Top](#)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维护其合法权益；部署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必须加大金融支持，发挥中小银行不可或缺的作用。会议决定，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一是优先支持具备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保就业能力。二是以支持补充资本金促改革、换机制，将中小银行完善治理、健全内控机制等作为支持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条件。三是压实地



方政府属地责任、银行及股东主体责任、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在全面清产核资、排查风险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的前提下，一行一策稳妥推进补充资本金，地方也要充分挖掘其他资源潜力给予支持。四是加强监管和全过程审计监督。对专项债合理补充资本金建立市场化的到期及时退出机制，严防道德风险。

会议指出，当前稳住经济基本盘，要着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的法规、维护其合法权益，迫在眉睫。会议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小企业的合同订立、资金保障、支付方式等作出规定，规范付款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规定不得以负责人变更、等待验收、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或公示，设定了违约拖欠投诉处理、失信惩戒、处分追责等条款。会议要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做落实法规、保障支付的表率，国有企业、大型平台企业也要严格执行法规规定。对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国务院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确保法规执行到位。

会议指出，国家高新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对示范引领更大力度改革开放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双创”和大学毕业生就业。一要在国家高新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相关改革试点政策，加强创新政策先行先试。放宽海外人才长期多次签证、居留许可等规定。二要加大国家高新区开放力度，鼓励与国外园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三要鼓励商业银行在国家高新区设立科技支行，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高新区开发建设主体上市融资。

[Top](#)

【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京举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6 月 2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1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作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加了对产品局部外观设计给予专利保护的规定，完善了有关产权激励、专利开放许可、专利保护和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作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加强对学生负担、学生安全、学生欺凌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强化家庭、学校、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网络保护责任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出口管制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明确临时管制实施期限届满如何处理，整合相关管制物项出口许可，强化管制物项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管理，进一步明确海关相关职责和权限等。



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适应预防、惩治犯罪的需要，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议案。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 30 条，加大对安全生产犯罪的预防惩治，对社会反映突出的高空抛物、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犯罪作出明确规定，完善惩治食品药品犯罪规定，完善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规定，加强企业产权刑法保护，强化公共卫生刑事法治保障，修改完善生态环境等其他领域犯罪规定等。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宁作了草案说明。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行政处罚制度，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草案对行政处罚的定义和种类，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行政处罚实施主体，行政处罚的适用、程序、执行和执法监督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作了草案说明。

为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数据安全法草案的议案。草案规定了支持促进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措施，建立健全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开展数据活动的组织、个人的主体责任等。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俊臣作了草案说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委员王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分组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6 月 28 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栗战书委员长参加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包括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审议。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二次审议稿和审议结果报告，充分研究吸收了包括香港各界人士在内的各方面的意见，体现了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精神，回应了有关方面的关切，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确，具体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尽快出台有关法律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能够切实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制度缺失和工作“短板”问题，有效打击相关犯罪行为 and 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有利于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6 月 30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49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会议决定免去胡泽君的审计署审计长职务，任命侯凯为审计署审计长，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50 号主席令予以任免。栗战书委员长出席会议。

6 月 30 日上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 162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月 30 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 163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作了说明。

6 月 30 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常委会组成人员 163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侯凯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 栗战书：坚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宪制秩序法治秩序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6 月 30 日下午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书作了讲话。

栗战书指出，本次常委会会议共审议 8 件法律和决定草案。会议最为重要的议程，是审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决定将这部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法律和决定获得全票通过，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栗战书说，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认为，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常委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作出了法律化、规范化、明晰化的具体安排。法律充分考虑两种制度差异和香港具体情况，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国性法律相衔接，与香港现有法律体系相兼容，体现了“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的原则，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长期繁荣发展，为确保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为保护外国人在香港的合法权益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为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法律支撑和保障。

栗战书指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法治秩序是香港发展的前提，这次立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施行后，将坚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力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法治秩序，防范和遏制外来干涉，保障香港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也必将为香港创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便利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发展香港经济、改善香港民生，充分展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

栗战书强调，有关方面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实施好这部重要法律，



加强法律的宣讲解读，加快建立健全与法律制度相适应的执行机制、专门机构和执法力量，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法定职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尽早完成有关立法，完善本地相关法律。要深入开展宪制法治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历史文化教育，弘扬爱国精神，增强国家意识，为法律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广泛的民意基础。

[Top](#)

【韩正：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7 月 3 日在北京出席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作出安排。

韩正强调，耕地保护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14 亿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首先要确保粮食生产能力这个根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积极稳妥有力有序推进整治工作。

韩正表示，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要讲求方式方法，把握好工作重点和节奏。要立行立改，对增量问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及时发现、及时整治、及时处理。要抓紧摸清情况、查清底数，科学制定方案，从实际出发，分步整治、分类处置存量问题。要突出工作重点，着力整治强占多占、非法出售等恶意占地建房行为，务求取得好的成效。要依法依规整治，使各项工作于法有据，确保不留后遗症。要完善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合理的建房需求，保护农民切身利益。要强化组织保障，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在分会场参加会议。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Top](#)

【郭声琨：提升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水平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7 月 3 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郭声琨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研究谋划新任务，不断提升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水平，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会议听取了开展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回头看”汇报，审议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方案、依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意见、《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督查工作方案。

郭声琨要求，要紧扣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要求，认真组织



开展督查，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全面有效落实。要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持续推进“回头看”，将违规过问或插手干预案件的“后门”堵死，把群众正常监督反映问题的“前门”打开，提升司法公信力。要精心组织实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适时在全国铺开，打一场刀刃向内、正风肃纪的攻坚战。要采取灵活务实的法律政策，以稳市场主体为着力点落实“六稳”“六保”任务，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以贯彻实施民法典为契机，全方位提升保障人民群众权利的层次和水平。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风险和制约】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台的最高水平的开放政策，是中国主动应对国内国际重大变局、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的战略抉择和积极探索。未来几年，海南将以建设自由贸易港为主要任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从海南发展的历史、当前的比较优势、宏观经济及周边环境、竞争对手条件等因素来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还存在诸多风险和制约因素。本文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发展和运行经验，参考改革开放后深圳的发展历程，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思考建议。

一、方案设计与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相比还存在差距

自由贸易港最早出现于 16 世纪的欧洲，二战后随国际经济合作不断加深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自由贸易港功能不断完善，已从单纯的货物中转港演变为国际贸易投资高度自由的特殊区域。自由贸易港的数量也不断增多，目前全球已有自由贸易港 130 多个。一些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如香港、纽约、新加坡、迪拜、鹿特丹、釜山等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交通枢纽等，不但带动了区域经济合作，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自由贸易港是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与自由贸易区相比，自由贸易港划定的区域更广泛，开放程度和经济自由度更高。除贸易自由外，还实现了投资、经营、人员出入等自由，并可以从事离岸业务。从世界成功的自由贸易港来看，虽然其发展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但核心都是通过吸引货物、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产生集聚效应，打造区域价值链的核心枢纽。例如，香港自由港的发展经验主要体现在贸易便利化、投资开放化、金融自由化和商事便捷化；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区的发展经验主要体现在贸易便利自由、投资开放透明、金融自由发达和营商环境宽松；迪拜自贸区的发展经验主要体现在管理规范、投资便利、金融自由和税收优惠。

中国的自由贸易港建设起步较晚。在此之前，2013年8月至2019年8月，中国已批准建立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当然，按照1973年《京都公约》对自由贸易区的界定，中国已经批准设立的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还达不到“境内关外”、“高度自由”的开放标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一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效果不尽理想。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普遍存在功能定位偏差、制度创新的协调成本高、难以承接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制度创新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过度关注通过招商引资实现产业集聚、加速经济增长等功能，导致放权有限，对其管理也一直沿袭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导致偏离和忽视了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这一核心功能。

海南是中国内地第一个自由贸易港，是中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举措。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要素流动自由化、开放范围、领域、层次都有了质的提高。但是，受制于国内开放程度低、行政干预多、经济环境复杂、金融和税收监管严及海南自身的条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因素，其开放程度与香港、新加坡等已成功运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例如，“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是考虑到大陆开放程度较低的现实条件，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制度安排的特征；一些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和货物、资本、人员、技术的自由流动附加了严格的前置条件，一些关键领域的政策措施设置了较长的过渡期；同时，实现一些政策目标需要具备的先决和配套条件是海南无法主导的，如实现金融开放和资金自由流动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放松外汇和资本管制等。总体而言，海南自由贸易港“资本自由兑换、投融资自由、贸易自由、监管自由、人员自由流动”等高度开放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综合比较优势并不突出

自由贸易港建设离不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在这方面，海南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中国第二大岛屿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海南具有离岛的天然便利，具备便捷的海运航道和多个优良港口。从生态自然环境看，海南冬季气候宜人，热带旅游资源和海洋资源丰富，降水丰沛、淡水资源充足，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植被覆盖率高。优越的自然条件、重要的交通和战略位置使海南成为中国南下的重要战略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在海洋强国、南海战略、“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除了区位和生态环境优势，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是海南最重要的优势。本世纪以来，国家对海南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海南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01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成立，海南经济增速加快，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2009年12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启了以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出台，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最近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开放范围更大、目标更远、内涵更丰富，海南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的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优惠及支持力度能否覆盖海南的先天不足。

海南经济基础薄弱，市场规模有限。自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立经济特区以来，海南经济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但因起点较低，经济基础仍比较薄弱，且经历过不少的弯路，经济总量在全国仍处于较落后水平。据统计，2019年，海南省GDP 5308.94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低于全国，GDP总量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28位。人均GDP 5650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6679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555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南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于内地一个中等地级市的规模，还不如深圳的一个区。从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消费情况看，至少在目前，海南的经济规模还相对较小，消费市场潜力也比较有限。这意味着，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投资和消费将主要靠外来的资源驱动，本岛的能力和潜力非常有限。

海南的经济结构仍不合理，农业比重过高、房地产畸形发展的特征明显。2019年，海南三大产业的比重为20.3：20.7：59（全国的数值为7.1：39：53.9），具有明显的从农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为主体过渡的特征。与建省并成立经济特区初期相比，海南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南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5.6%，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业等传统服务产业上，金融、保险、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占有重要的地位，占比为16%；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高达48.5%，房地产业已成为海南经济不折不扣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在旅游养老和投资资金的推动下，海南的房价上涨较快，海口、三亚等地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接近一线城市。近几年，即使在限购的政策下，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泡沫。

海南工业结构单一，基础薄弱，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工业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主要短板，工业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主要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基础工业在政策扶持下，在工业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总体看，海南的工业仍主要集中于传统的、低端的产业，轻重比例失衡，内部结构不合理，远未达到向现代先进制造业转型的水平。从香港、深圳的发展历程看，在成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或城市）之前，都经历过一个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确定了海南未来重点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工业结构单一、制造业基础薄弱、缺乏支柱型产业将制约先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研发方面，海南的投入水平较低，2018年海南省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0.56%，远低于全国水平的2.1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万人专利授权量、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占GDP比重也远落后于全国水平，研发投入产出效率非常低。没有高端制造业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未来的发展重心只能再次倾



向于金融和地产。但是，海南金融业增加值仅 392.23 亿元，约占 GDP 的 7.4%，金融业短期内也难以成为支柱产业。海南能否走出历史的循环并摆脱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无法切割的历史和投机基因影响自由贸易港建设

对于海南的发展，中央一直给予政策倾斜，以弥补海南自然禀赋的不足。但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诸多的优惠政策并没有带来的预期的效果，时至今日，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依然差强人意。回顾海南发展的历史，有许多事件和教训值得反思。

1980 年，国务院出台《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赋予海南准特区地位。但是，1985 年，仍属于广东的海南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汽车走私事件；

1988 年 4 月，海南建省并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后，迅速掀起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热，短期内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膨胀带来了风险的迅速上升。1993 年，“国十六条”出台，重点整顿金融秩序，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海南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与广西北海成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标志性典型。在此后的时间里，海南的金融风险事件不断发生：1998 年 6 月，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成为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家倒闭的省级银行；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十大期货逼仓事件，海南独占其二（分别是 1995 年 F703 咖啡逼仓事件和 1996 年天胶 608 逼仓事件），并导致 1998 年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关闭。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影响持续十多年，海南虽然最终走出困境，但是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与同期开放的深圳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2009 年 12 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大量投机资金进入海南，海南的房价再度暴涨。目前，在各种政策支持下，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仍在继续。

回顾海南发展的历史轨迹，国家给予海南的政策越来越优惠，每一次政策出台都是巨大的发展机遇。在三次大的历史机遇（1984 年建省之前、1988 年建省之后、2009 年创建国际旅游岛）面前，海南都急于把长期利好政策进行短期套现，使优惠政策成为投机资本利用和炒作的工具，导致政策实施虎头蛇尾，偏离预期目标。这种状况一再发生，必然会影响对自由贸易港政策的信心。对此，业内人士已从地域文化、资本环境、官员素质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解释。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政策支持和优惠力度前所未有、国内未有，海南再度迎来发展的窗口和难得的机遇，但能否抓住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四、人才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人口和劳动力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海南地广人稀，劳动力资源并不丰富。2019 年，海南省常住人口 944.72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9.23%。从人口总量看，海南高于香港（750.07 万人），低于深圳（1343.88 万人）。但海南的面积 3.54 万平方公里，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和北部，人口密度远远低于香港和深圳。海南人口自然增长缓慢，自 1988 年海南建省并成立经济特区以来，常住人口在 30 多年间仅增加了 317 万。即使是 2009 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海南的常住人口 10 年间也才增长了 77.57 万，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1% 以下。在人口增速放缓的同时，海南还出现了劳动人口年龄上



升、老龄化加深、人口迁移流动活跃等趋势。

海南高等教育薄弱，生源流失严重，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率也不高。海南现有本科学校 8 所，专科学校 12 所。生源流失一直是海南当地的痛点，每年高考全省前 500 名的考生，极少报考海南本地的大学，出去读大学因就业困难回去的也很少。据统计，2018 年，海南专科及以上毕业生 51869 人，其中专科占 48.1%，本科占 49.5%，硕士博士占 2.4%。万人在校研究生人数为 7.4 人，在全国排名第 26 位。在海南本地就业的毕业生中，本科生占当年毕业本科生的 49.59%，硕士生占 40.31%，博士生占 36.36%。这意味着，海南当地培养、当年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将近三分之二都不在当地就业，去外地就业的毕业生相当一部分去往一海之隔的珠三角。

海南高素质人才和专业化人才严重短缺，高物价、高房价、低收入制约外地人才流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是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与其发展定位匹配的人口和人才结构，需要足够的优质人才参与支持。但是，人口增长缓慢、人才短缺是长期以来影响海南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依靠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依靠现有的人才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只能寄希望于外部人口和人才的流入。海南政府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2018 年发布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根据设定的目标，海南争取到 2020 年吸引各类人才 20 万左右，常住人口达到 996 万左右；到 2025 年，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的目标，到 2030 年常住人口达到 1248 万左右。但实现上述目标非常困难，至少 2020 年的目标已经确定无法实现。海南地方政府为吸引人才流入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海南的房价高、教育资源缺乏、收入低而消费水平高等现实因素将长期影响和制约人口流入。

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自由贸易港的成功归根到底要依靠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国际看，现有的自由贸易港多数都是区域或全球贸易、金融、航运中心，通过对周边或经过的资源产生虹吸效应，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情况下，自由贸易港之间、自由贸易港与周边大型城市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竞争。

在自由贸易港之间，海南主要面临着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有全球最佳的赋税环境、最简单便利的通关程序、自由的金融政策和资金流通、享誉全球的营商环境，各项衡量自由贸易港的关键指标均在全球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香港还有全球公认的透明、法治、清廉、规范的特别行政区政府。而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成为亚太而至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和金融中心，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保险、财务运作、外汇交易等领域地位领先，其税率和税法在吸引全球投资方面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并具有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严格的监管体系。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才流入渠道畅通，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对创新型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香港和新加坡是世界成熟的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估多年来一直在世界排名前五。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数字科技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国际大环境下，多数自由贸易港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提升竞争力。从近年要素国际流动的方向看，成熟、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对资金、



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短期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因此，相对于香港和新加坡这种成熟、发达的自由贸易港，海南还有很多领域需要学习提高。

在本区域，海南自由贸易港还将面临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竞争，并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影响。海南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上海、深圳，其经济体量大体是上海的七分之一、深圳的五分之一。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主要借助于国家的税收、产业等优惠政策，在金融、贸易、航运、科技等与上海、深圳和周边区域产生竞争。但是，短期内，国家政策的优惠尚不足以完全平衡和弥补其他条件的不足。上海正在进一步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对长三角金融支持作用远非海南可比。而从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深圳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对接了香港和珠三角的优质资源。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珠三角成为深圳的腹地，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本和市场。而与海南隔海相望的粤西和桂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具备珠三角的优势和条件，对海南的助力有限。

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加工制造业还将面临越南等国的竞争。为避免成为“避税天堂”，海南的多项优惠政策都强调“实质性运营”的条件，并通过“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安排鼓励加工制造业发展，以补上第二产业发展的短板。从地理位置看，海南发展加工制造业将直接与隔海相望的越南产生竞争。越南自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全面推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开放，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到目前为止，越南已参加16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2项已签署并生效。尤其是2016年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8年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越南对多个国家市场的出口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尽管在经济发展水平、资金、技术方面还存在不足，但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低的生产成本和高度开放的政策，近年来越南承接了大量进行产业转移的加工制造企业，包括一部分珠三角外迁的企业。除越南外，近年来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也主动谈判和加入一些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协定，未来也将在多领域与海南展开竞争。

六、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一是顺应大势，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破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制约。当前，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国内经济也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的困难和考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表明了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和决心。在世界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中国要把握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大势，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重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消除体制性、制度性障碍，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对于海南而言，应正视存在的种种问题，认真吸取与历次发展机遇失之交臂的教训，踏踏实实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不给历史留下遗憾。

二是重视人才，尤其要注意配备、培养优秀的政策执行和实施者。回顾总结世界上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发展历史，人才一直都是最有价值、最稀缺的资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要突破人才约束的种种瓶颈，消除影响制约各类人才流入的障碍。在各类人才中，不畏困难、坚决推进、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的人才尤为重要。从深圳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看，任仲夷、谢非、吴南生、梁湘、袁庚等这些改革的先行者、推动者、实施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功，也主要取决于政策的坚决执行和扎实落地，取决于是否有思想开放、勇于担当、坚持推进改革的地方领导人。

三是正视短板，调整优化海南经济和产业结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能逾越特定的产业发展阶段，也无法回避海南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一定要认真吸取海南在历史选择方面的教训，深刻认识房地产过度发展的危害，防范自由贸易港建设再度成为房地产的盛宴。未来，海南要逐步降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利用好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植实体经济，弥补工业结构单一、制造业基础薄弱、缺乏支柱型实体产业的短板，为自由贸易港的长期发展奠定健康、合理的产业基础。

四是吸取教训，避免过度投机再度冲击自由贸易港建设。历史上的投机套利活动使海南屡次错失发展机遇，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并动摇了对未来对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信心。海南应以史为鉴，通过制度设计与严格监管抑制各种投机套利活动，避免再度沦为避税港和金融投机的热土。同时，充分认识到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真研究分析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际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经验教训，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创新的正确方向，努力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Top](#)

【外债合意规模之“扩”与局部风险之“防”】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2020年，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重塑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或首次同时陷入衰退，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

整体而言，全球“债务-拉弗曲线”均发生动态变化，在合意规模内适当扩张外债可作为部分经济体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结构上讲，美元流动性仍是全球投融资核心，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成为美元融资主要边际驱动力。

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规模看，中国非金融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外债规模适度上升不会引起信用利差显著上升。但外债融资中面临的汇率、利率、再融资等风险需妥善考虑：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本币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并无海外收入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的美元债占比明显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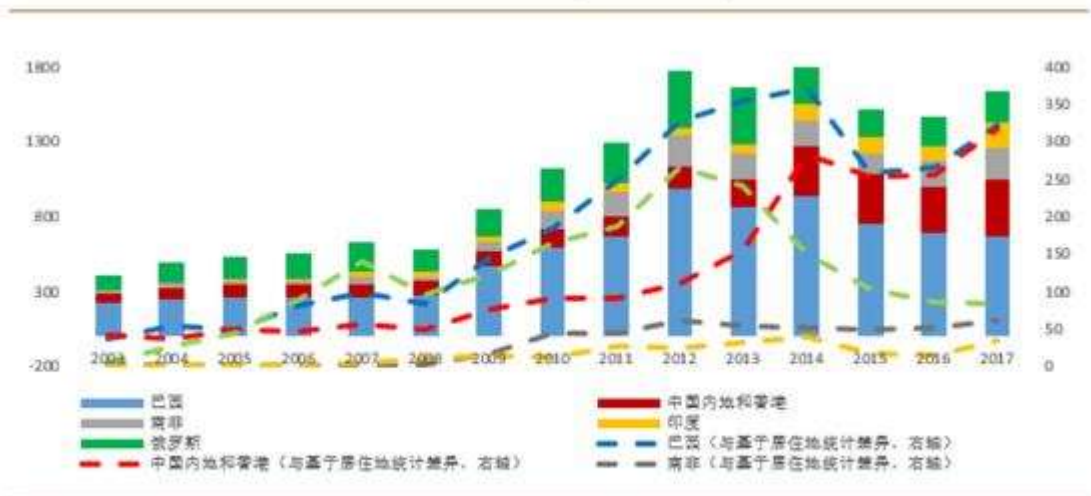
合意的外债杠杆可作为逆周期调节重要抓手，疫情冲击下关注动态的“债务-拉弗曲线”。从历史上看，不同经济体对外主权负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平滑消费/税收政策，这与经常项目逆差的动机类似；第二，提前消费，这主要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源于主观贴现率大于现实利率。从现实的负债选择看，平滑消费的动机通常带来逆周期的负债行为，但信用利差具有顺周期性。例如，不少新兴市场曾出现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支配逆周期负债行为的现象，这也使得债务风险成为商业周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当前，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信用利差明显较低，在此基础上适当负债不会出现由于利差显著上升而导致的消费波动高于产出波动。因此，以平滑消费/财政政策作为适度增加外债水平的主要动因，而非以过度刺激经济为目的，有望通过合意的债务杠杆助力逆周期调节。事实上，合意的外债规模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理论上讲，合意外债规模可以描述为融资收入与债务存量之间的“债务-拉弗曲线”。当债务规模较



低时，一国可以接近无风险利率发行外债，但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违约风险上升带来信用利差增加。“债务-拉弗曲线”的峰值对应于可以获取的最大融资收入，在此之后，信用利差带来的边际融资支出将超过边际融资规模所带来的融资收入。“债务-拉弗曲线”的存在也使得给定融资收入规模，存在低负债低信用利差和高负债高信用利差两种均衡。多重均衡的出现令确定合意债务规模变得重要，因为当存在融资刚性时，债务规模存在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旦发生从低债务向高债务的均衡移动，信用利差和违约风险都会迅速上升。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全球宏观政策呈现出“货币+财政”的双宽松搭配，全球性的债务规模上升是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地在动态合意债务规模之内适度增加负债利大于弊。

美元流动性是全球投融资重要系统变量，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为美元融资新驱动。2020年3月，美元流动性恐慌逐步压过其他冲击，并借由非金融风险而放大并急速恶化，成为全球市场异变的核心动因。当前，尽管美国经济体量仅占全球不足四分之一，但美元仍然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投融资货币。2019年底，美元计价的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债券规模达22.6万亿美元，分别占其总存量和全球GDP约50%和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借贷中的美元占比更是逆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现已重回本世纪以来的高位，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从区域分布看，美元融资网络国际化程度较高且彼此关联性强，终端使用者和供给者也高度分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融资规模在欧洲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有所下降，但在新兴市场地区相对活跃，当前其占美元债务融资中的比重已从10%上升至19%。其中，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离岸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券余额激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BIS的数据，当前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余额为5900亿，在新兴市场中占比36%。其二，从参与主体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为中介的美元融资减少，而非银行市场化融资占比更大。但美国境外的非银金融机构获取美元融资的渠道相对有限和不稳定，也令其在压力下容易引发恐慌式抛售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此外，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全球外债负债方的真实分布与基于居住地(residence-based)的统计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持有的新兴市场公司债实际规模较基于处所的统计高30%，从其持有的金砖国家债务总量看，低估程度甚至高达100%。

美国持有的金砖国家债务总量按居住地口径存在明显低估 (单位: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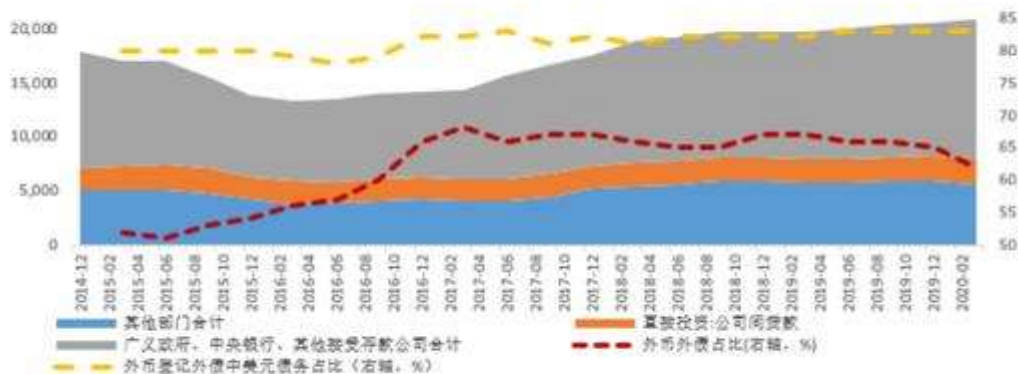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Bertout, Carol C., Beau Bressier,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19)



外债融资需综合考虑汇率、利率、再融资风险，而币种搭配和融资结构是串联几大风险的核心。在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下，债务和币值的双重约束令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而外币融资的成本和可得性并不稳定，众多的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和借贷者甚至会因同步行为（synchronized behaviour）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违约潮。学理表明，外债违约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违约带来了双边贸易的下滑，影响了贸易导向的企业；二是违约通常与银行危机相关联，可能导致持续的衰退。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本国银行出于资产流动性需要持有相当比例的主权债务，如果主权违约会削弱其偿付能力，并影响信贷、投资、经济增长。通常认为，主权债务的违约不会发生于本币债务，因为政府有能力对其进行货币化，但事实上考虑到潜在的通胀成本，货币化不一定是政府的实际选项。比如，对于 100 个经济体在 1996-2012 年期间样本的研究显示，在总共 58 次主权违约事件中，有 31 次是本币违约，比如 1998 年俄罗斯和 1999 年土耳其的案例，而其中 15 次是本外币同时违约。经验表明，国内企业在本地银行借款规模提升会减弱主权本币债的违约倾向，因为信贷收缩将增加违约的成本，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对于本币外债也不容忽视。2017-2018 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形成共振，美元升值和信用利差同时上升，导致中国企业债务的违约规模和占比均急剧上升。根据 BIS 的统计，从 2016 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规模明显增加，其中本币债务违约超过累计违约规模的四分之三。所以，在当前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需要高度关注合意的本币外债规模。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外债整体风险可控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Wind 和我们的计算

在整体外债上升周期宜把握部门负债平衡性，以避免局部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关联违约风险。研究显示，依赖于私人部门外币融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更高的主权违约风险。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存在私人部门借外币外债而公共部门借本币外债的现象。比如从 2003 年-2013 年，14 个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本币外债平均占比从 15% 上升到 60%。对于存在外币外债和本币收入型资产负债货币错配的企业部门，本币贬值会冲击公司净资产并由于融资约束带来紧缩压力，这也令公共部门产生了“浮动恐慌”，导致其在面临主权债务偿付压力时不会轻易选择贬值以货币化本币外债，而更多出现违约。定量研究显示，私人部门



外币外债占 GDP 比重 10%的提升伴随着主权本币信用利差 30 个基点的增加。对于中国而言，企业部门外债的期限和行业风险不容忽视。截至 2019 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外债为 8300 亿美元，占整体外债比重约四成。从整体外债币种结构看，外币外债占 65%，而美元债务在外币登记外债中占 83%。从相对 GDP 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 5.8%和 26.8%，整体风险可控。但 BIS 指出：从期限看，未来五年将有 4880 亿的中国企业美元债务到期，负债较高的企业将面临持续的还款/再融资压力；从行业上看，并无海外收入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美元债占总余额明显偏高（约 40%），而 2021 年底，开发商将分别有 800 亿美元和 1650 亿人民币的债务到期。

[Top](#)

【国民经济诸多问题的总症结是土地体制扭曲】

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

1. 土地体制扭曲，是产能过剩和制造业衰微的基础性症结。

在经济运行国内消费需求与工业产能的平衡中，在产业结构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平衡中，如果农民在土地上收入流动得不到合理地恢复，如果高房价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转移部分降低不下来，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制造业衰微这一问题，根本就无法加以缓解。

如果想要增强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改革农村政府与农民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土地征收和交易体制，不放开合作建房、私人建房与房地产开发建设多渠道供给公平竞争，将房价逐步地降低到合理价格，居民就没有足够的支出向一般消费品市场流动。

2. 土地体制扭曲，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房屋等不能双向顺畅流动和互换的梗阻。

从人口流动看，农村出去无法市民化，土地和房屋不能市场化退出和没有财产性交易收入，既因为在农村有不能货币化变现的耕地和宅地无法放弃，又没有不动产按照市价变现后的收入成为进入城市变成市民的经济能力。而城市中拟到农村居住、消费和创业的人口，也因土地宅地不能交易，获得不了耕地、园地和宅地，无法顺畅地向乡村流动。不动产也不能双向置换。

从资本流动看，因土地不能交易，不是资产，产权不清和不安全，城镇企业和个人投资、银行信贷资金（土地不能交易，就不能定价，就无法交易，万一还本付息出问题，风险无法通过交易退出。因此，即使政府发无数个文件让银行给农业和农民贷款，银行也不可能真正贷款给农业和农民。）等，不向农村农业流



动。也因无法投资信贷组合、无法扩大宅院（有的邻居已经几十年在城市生活，宅地闲置，但无法以市场价交易出售给邻居）、无法投资办恒产性的农场（耕地不让交易）、无法以地为资本创业、无法获得建设用地等，农村中积累和务工流入的储蓄资金，只能再向农村农业外流出。

3. 土地体制扭曲，传导给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使增长动力越来越弱。

劳动力（劳动力负增长年 1%）和资本投入产出（从要素投入产出看，资本的流动性很强，扭曲部分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财务公司等再贷款给民营经济，或者自己的生产向民营经济外包，通过非扭曲体制得到了纠正，国企改革的增长潜能不大）的增长动力逐步在减弱，数字经济（逻辑上其实是节约要素成本和收缩 GDP 的经济）和其他技术要素何时能够支撑或者推动增长稳定或上行还不能确定，土地和房屋经济的增长也开始放慢，但是，630 万亿元几乎零价值的农村和城镇可交易划拨土地，不是资产，不能与资本和劳动组合，形成新的增长潜能。其实，由于中国要素中土地稀缺、未来转折到资产和财富性工业化，置业和不动产增加是经济发展的特征，加上改革是其从零价值到市场价扭曲的纠正，土地要素的替代弹性和配置改善增长潜能最大。

4. 土地体制扭曲，阻挡住经济发展从一般消费品工业化阶段向资产财富型工业化阶段的转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小，其中财产性收入差距 12: 1，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只有种地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但因土地不是资产，没有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资本的创业经营收入。

城乡居民拥有投资资产和房屋资产的差距也分别为 13: 1 和 11.68: 1。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土地和宅院禁止交易，是生产和生活资料，不是资产；城市居民的住宅和其他不动产，可以交易，是他们的资产。从城乡土地房屋的产权界定上看，农村较为模糊，企业和个人的产权不安全；城镇较为清晰，产权受到侵犯，起码可以得到有关法律的保护。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果目前的土地体制不改革，近 8 亿农民无法置业，无法拥有资产，无法分享资产财富型工业化阶段的发展红利，无法通过积累资产而富裕起来。

也就是说，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土地体制不改革，无法从消费品工业化阶段向资产型工业化阶段转折，无法从小康国家向富裕社会迈进。

5. 土地体制扭曲，使价格、债务、货币无法平稳运行，积累下去，暴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and 危机的概率很大。

目前中国货币/GDP 比例为各大国中最高的，货币已经超发很多。土地房屋价格连续 22 年高速上涨，房价收入比泡沫已经很大，不动产价格水平已经很高，但土地和房屋价格还在继续上涨。2019 年，居民按揭和房地产商债务，再假定政府债务一半与土地有关，房地产领域的债务占到全国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总债务中的 52.4%。而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需要进一步扩大赤字和债务规模，实行更加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资产保证，那么，土地和房屋不动产价格泡沫会越来越大，债务周转、货币币值、相对汇率、货币体系、金融机



构等各方面，会陷入不稳定和不安全状态之中。

总之，目前几乎所有的国民经济运行紊乱和增长乏力，系统去观察，都源于相当多土地不能资产化和货币化，不能由市场交易配置这个症结上。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省部级干部调整，程福波任陕西省副省长】

● 程福波任陕西省副省长

7月3日举行的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经表决，决定任命程福波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程福波，男，1970年9月生，此前担任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省委常委。

● 福建省原省长唐登杰出任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委领导”栏目近日进行更新，据最新名单显示，唐登杰已任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

唐登杰，1964年6月生，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工信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务，2017年底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次年1月当选福建省省长。近日，唐登杰辞去省长职务。

● 王宁任福建省代省长，崔永辉任福建省副省长

7月2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因工作岗位调整，决定接受唐登杰辞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王宁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决定任命崔永辉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王宁，1961年4月生，是第十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曾长期在住建部工作，



2015年12月调福建省，历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2018年起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唐登杰，1964年6月生，曾任工信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8年1月当选福建省省长。

崔永辉，1970年11月出生，长期在湖北省工作，2017年任荆州市市长。

● 海西州委书记文国栋出任青海省政府党组成员

6月30日，青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文国栋以省政府党组成员身份出席会议。此信息显示，现任海西州委书记的文国栋已任青海省政府党组成员。

文国栋，1969年8月生，曾任玉树州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起任海西州委书记，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

● 刘宁任辽宁省代省长

7月1日上午，辽宁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刘宁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省长。

刘宁，1962年1月生，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曾长期在水利部任职，2017年调任青海省委副书记，2018年9月当选青海省省长，近日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原任辽宁省省长的唐一军今年4月已出任司法部部长。

● 深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徐文海调任湖北省政府党组成员

6月28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后，湖北省随即召开会议对长江汉江禁捕退捕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徐文海出席会议。据了解，这是徐文海首次以湖北省政府党组成员身份公开亮相。

徐文海，1965年9月生，长期在广东省工作，历任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局长、交管局局长，广东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等职务，2016年任深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7月3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郑雁雄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任命李江舟、孙青野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邢自强：全球经济将呈现 V 型复苏，三大改革助力中国经济】

伴随着主要经济体陆续解除封锁措施，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复苏轨道。高频数据显示四五月份以来经济活动已触底回升。预计全球 GDP 同比增速可在今年二季度探底（-8.6%），并于明年一季度回升到疫情之前 3% 的增长水平。

在第二波疫情下，全球还能 V 型复苏么？疫情如何在长期重塑全球和中国经济？世界地缘政治新趋势对产业、公司策略有何影响？

● 全球经济将呈现 V 型复苏

本轮经济衰退和复苏总体将呈现 V 型，原因有三：

第一，此次危机本质为疫情引起的外部冲击，而非内生冲击。虽然疫情隔断措施造成经济活动的停顿，但相比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前，发达经济体内部失衡情况较为温和，金融系统更为稳健，居民杠杆率处于合理区间，因此经济恢复的速度较快。

第二，当前企业去杠杆压力较为温和。全球非金融私有部门的杠杆率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迅速下降，并于近几年保持平稳，使此轮周期中企业去杠杆压力减缓。

第三，政策力度强，货币财政双管齐下。此轮周期各国经济刺激应对迅速，短短四个月内，全球政策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同时，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财政和货币刺激协调配合，双管齐下，一改过去十年总是货币雷声大、财政雨点小的特点。最主要的四个发达经济体的总财政赤字，会从 2019 年占 GDP 5.6% 的水平扩张到今年的 16.9% 的历史高位。同时，四家主要央行今年和明年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将达到 GDP 的 28%，远高于金融危机时的 7.1%。

目前市场仍对 V 型复苏存在疑虑，尤其是担忧一些国家疫情复发、消费承压、后续政策刺激力度难料等三重阴霾。对这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疫情如有二次复发现象，在多数国家范围可控。跟疫情初期相比，目前各国核酸检测能力大幅增强，疫情追踪手段提升，推行社交疏离措施也更有针对性，重新进入一轮大规模封城停摆的可能性较低。同时，目前医疗系统面临的压力已大幅缓解，公共卫生部门能够未雨绸缪。此外，疫苗研发上的进展也可能



为全球打赢这场战役带来曙光。

其次，消费者行为稳健复苏。目前一些经济体大规模的失业潮以及常态化的社交疏离措施是否显著拖累消费复苏？2008-2009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显示，消费可领先于就业市场回暖。美国的消费在 2010 年三季度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当时其失业率相对峰值水平仅有微弱改善。同样，欧元区消费水平在 2010 年四季度已基本恢复，即便失业率一直稳定在 10%左右。另外，此次危机之前家庭资产负债表相对稳健，再加上政府针对受困群体推出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这都为消费复苏托底。当然，常态化的社交疏离措施将会拖累特定行业消费（国际旅行、室外娱乐、线下购物），但消费行为的转变将会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如在线消费、周边游、国内游），部分对冲其他消费行业的损失。

另外，政策刺激料可持续。鉴于目前一些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产出缺口仍然很大，各国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政策取向。以美国为例，预期今年还有 1 万亿美元的新增财政刺激，这将把政府的赤字规模推升到 194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 疫情或将从三个方面重塑发达经济体

劳动力市场及劳动生产率：此次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家办公模式更为普及，并可能使之前因故脱离劳动力市场的部分群体（如女性职工）重新就业。儿童抚养问题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以及收入水平，在家办公的普及将有利于女性职工就业增加并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另外，此次冲击将可能迫使企业加速向在线商务模式转换，并采用高效率技术如云计算、自动化、大数据等提升生产率。疫情之下服务业首当其冲，尤其是餐饮、酒店等行业，消费者风险偏好增加以及中小企业流失恐将导致餐厅及其他服务机构减少，但考虑到这些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速明显低于制造业，整体经济结构反而可能变得更有效率。服务业也将被迫采取更为有效的线上模式。

消费行为：在家办公的普及将会对不同行业造成深远影响。如服装、在外餐饮、交通等行业，可能面临消费者削减相关支出的影响。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将促使家庭增加防御性储蓄。

居住行为：在家办公消除了地理上的限制，使得员工可以选择更为偏远的地区作为居住地。对于仍然倾向于城市生活的人群来讲，在家办公可能会促使其青睐独立租住房屋，以释放更多工作空间，尽管这种选择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

● 中国比其他国家先步入复苏轨道

由于疫情较早得到控制，中国相比其他国家提前步入了复苏轨道，制造业和建设投资两大引擎已早在四月便已经恢复。接下来接力棒交给消费和服务业。预计 GDP 同比增速将于二季度由负转正，并于今年四季度达到约 6%的潜在增长水平。全年增长达 2%，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增长的。

当前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仍面临就业和外需两大挑战，但也不乏亮点：

其一，减税降费、境外消费回流，就业压力缓解。笔者预计，下半年消费增速将显著改善，这得益于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及就业的正向作用，前期被压制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以及疫情下境外旅行减少带来的消费回流。中国消费者每年在境外花费约 2600 亿美元，贡献了全球奢侈品三分之二的增长、化妆品



一半的增长。接下来，这部分消费有望回流至国内，变成境内消费占主导。这对与教育、奢侈品、化妆品、免税商品和旅游消费等相关的行业均有较强正面作用，也对中国经常账户有正面意义——过去每年 2600 亿美元的境外消费是中国经常账户项下服务项逆差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消费回流之下，这一情况有望改善。

其二，外需疲软，但中国市场份额继续逆市提升。海外经济体衰退，中国出口订单从 2 月份开始一直下行，预示着短期内出口增速下滑。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占全球的市场份额，依然延续过去三年不断提升的趋势，显示中国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出口相对其他国家来讲依然保持竞争力。随着全球经济在下半年反弹，出口在未来几个月有望见底，逐步回暖。

其三，政策支持仍将持续。今年的广义财政赤字将大幅提高，其中一部分用于增加公共投资，尤其是新基建、城市群互联互通、旧城改造等领域，而另一部分则用于减税降费，包括对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减免。同时，货币政策将保持灵活适度，以支持政府债券的进一步发行。近期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回升，更多地反映了中国逐步恢复到常态下的利率环境，以避免超低利率环境下一些资金套利行为，但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和信用环境彻底转向收紧。未来几个月政府债券每月发行量可达 1 万亿人民币左右，货币和财政政策进一步配合协调应当会悄然而至，确保政府发债不挤出私人部门信贷，社融同比增速可保持在当前的较快水平。

物价方面，随着供需负缺口的不断收窄，新冠疫情带来的通缩压力将于今年下半年逐步减缓，明年一季度或会进入再通胀轨道。

● 三大改革助中国经济应对“逆全球化”现象

疫情之后，全球从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加速迈向多极世界。大摩的 142 位分析人员与宏观团队一起，最近发布了 2020 年蓝皮书，聚焦这一世界地缘政治新趋势，对产业、公司和经济的影响。预计中美将在科技、地缘、医疗、经济领域展开全面竞争。多边机制仍会日益衰退，欧日和其他经济体在夹缝中平衡，力图不错过两边经济机遇。跨国企业会改变策略，适应新局势。

中长期来看，我们预计，中国在 2022-2024 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5%，但其中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依然可以保持在 2.3% 的年均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独占鳌头，这主要得益于未来三大改革——新型城市化、产业链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将对冲中国在人口、债务以及逆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增长压力。

新型城市化：中国城镇化 2.0 将结合新基建、要素市场改革，两条腿走路。新基建（如 5G、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短期可以用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可以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及生产率的提高。另外，中国已经明确了要素市场改革方案，通过土地、公共资源改革，促进经济资源在几大重点城市群的有效配置，提升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释放生产力。

产业链进一步开放：为应对逆全球化现象对供应链带来的冲击，中国将加速扩大市场开放、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同时，加快科技领域（如半导体和软件）的生产国内化以减少外部冲击。这些措施，再加上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将持续吸引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外资企业将更多地采用“在中国，为中国”战略（在中国的生产主要服务国内市场），即开创“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

人民币资产国际化：随着中国经常账户逐渐步入结构性赤字，我们认为政府将深化监管改革并加速金融市场开放，以吸引更多外资流入。QFII、RQFII 扩大



改革，为债券投资和股市投资提供风险管理对冲工具，加强上市公司监管，有助于吸引优秀企业回归中国上市。

在全球呈现“多极世界”的经济大势下，大摩通过详尽的调研，分析了全球 35 大行业、市值达 31 万亿美元的近 600 家公司，根据它们对全球化的依赖度和脱钩的难易度，将全球企业分为四个象限。我们发现，中国有接近 1/5 的领军企业，更可能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成为“地区冠军”，主要分布在互联网、旅游与娱乐、支付、企业软件等领域。而一些以往的全球化冠军则可能成为新秩序下的输家，如美国大公司中超过 22% 分布在半导体、互联网、航空器、汽车等领域，或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丧失市场份额。而医疗、金融、文娱、奢侈品等领域的环球企业，由于门槛较高，行业护城河效应强，有望继续在多极化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邢自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Top](#)

【吴金铎：中国消费的韧性和弹性】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 82.7 万亿美元 GDP 总量中（注：不变价计算），大约 60 万亿美元来自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约 72.6%。2019 年美国实际 GDP 中个人消费支出的贡献高达 76.52%。2014 年 6 月开始中国最终消费支出超过资本形成总额，成为稳定的第一大增长贡献来源。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开季中国出现史无前例的负增长，第一季度 GDP 同比-6.8% 增速中最终消费对 GDP 的拉动作用为-4.36%，贡献率为 64.1%，消费不振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

当前海外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再度反弹，常态化“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压力使得某些服务业的重启和消费的全面恢复困难重重。然而中国是大国经济体，内需潜力大，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突破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多样化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与日俱增。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因此，复兴和提振消费，不仅是当前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动力来源。

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如何释放消费潜力？长远来看，如何发挥好消费在经济中的持久动力？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 GDP 核算中最终消费为何不等？

考察消费人们常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 GDP 核算中的最终消费这两项指标，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别。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数据，2019 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99.09 万亿元，其中最终消费支出 55.15 万亿元，而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1.16 万亿元，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者相差近 13.98 万亿元。此外，2018 年之后这两项指标之间的差额并没有出现收敛，相反有扩大趋势。

是什么导致了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差距？



首先，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口径，全社会零售总额包括“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两部分。因此，最终消费支出超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部分包括剔除餐饮收入之外的所有其它服务业消费数据，具体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与零售、住宿、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房地产、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 14 个类别。那么最终消费支出中剔除餐饮收入之外的所有其它服务业消费规模究竟有多大？由于服务业消费没有直接可得的官方数据，笔者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了简单计算。2019 年中国所有服务项增加值总规模 53.4 万亿元，但服务业增加值不仅包括服务业的消费数据，也包含服务业投资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的数据。2019 年中国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37.58 万亿元，同期服务贸易净出口-1.5 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剔除这两项之后得到消费贡献的部分，大约为 14.32 万亿元。考虑到餐饮统计上的重合及统计口径误差等，这一数据与前文所提的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差额不相上下。此外，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可得到最终消费中商品零售与服务业消费贡献比例大约为 75:25，即服务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大约为 1/4。

其次，近年来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滑幅度快于最终消费增速下滑，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未出现收敛相反近年不断发散。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2016 年同比增速正式下降到个位数；而 GDP 中最终消费支出名义增速 2019 年才下降到个位数。2019 年全社会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速 8%，实际增速仅 6%，速度较 2015 年之前两位数增速明显下降。而 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名义同比增速 8.96%，在这之前保持了近 10 年的两位数增长，近两年变化并不大。由此可见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下降所致，而包括所有服务项消费的最终消费支出目前仍然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两者差距近年扩大主要源于非商品零售消费，即服务消费增速不断提高所致，预计这一趋势未来若干年将延续。

● 公共消费的三重平衡

按主体分，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占比 2008 年以后一直稳定维持在 70:30。2019 年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 16.56 万亿元，较 2018 年增加 1.36 万亿元，非常稳定。政府公共消费的实现形式是财政支出和政府购买。中国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投资和公共消费，而政府购买主要包括社会服务以及商品消费等领域。中国财政支出每年下达的资金各领域的比例相对稳定，这保证了政府公共消费的相对稳定，因此一般情况下政府消费支出相对于居民消费支出更可控。3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政府投资与公共消费都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在选择宏观调控手段的时候，政府一般会权衡三重平衡：如何平衡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比例、怎样科学支配公共消费和政府自身消费，公共投资中生产型投资与消费型投资的比例多少才算合理？这些关系的平衡关系到政府工作目标的优先顺序。

首先，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以“六保”促“六稳”。2020 年取消 GDP 增长



目标，更加注重底线思维。一般而言，政府投资更直接作用于效率，而公共消费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等更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和公共消费与“六保”和脱贫攻坚目标更契合。

其次，公共消费比政府消费受益面更广，更能精准的促进“六保”进而社会公平。基于此，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以上”，显示出政府强调贴近民生和促进公平的公共消费，而减少政府层级的消费。

最后，两会提出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重点提及“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数据中心”等，这些属于生产型投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老旧小区改造等属于消费型投资，这两者都是有效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居民消费怎么了？

中国居民消费占全社会总消费的七成，因此居民消费数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社会消费的全局。是什么造就了居民消费的繁荣，又是什么阻碍了居民消费的恢复？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相当稳定的关系”，因此理论上消费取决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此外，商品价格、家庭财富、消费者偏好、以及消费者年龄结构、利率水平、信贷可得性以及社会习惯和特殊规定都是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

2020 年新冠肺炎对中国消费带来较大冲击：今年 2 月开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急剧下滑至负两位数增长；5 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973 亿元，同比增速-2.8%，较前四个月降幅大幅收窄。但疫情常态化防控与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之间存在矛盾，国内疫情反复，海外疫情复杂使得消费的完全恢复有一定困难。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加大了供给端约束，加上交通物流等带来的不便，疫情限制了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但 4 月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下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居民出行逐渐正常化，4 月开始消费数据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当前由于个别地区海外疫情内输，还有部分市区疫情二次爆发，疫情反复使得部分可选消费和服务业再次面临挑战。

其次，疫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两个问题还没有科学答案。疫苗在中国取得突破进展但还未全临床推广，种种不确定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意愿，加深了居民对未来的担忧。

再次，疫情加大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出于预防性动机需要，居民会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央行数据显示，2020 年前五个月境内本外币存款较去年同期多增 84.27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今年前 5 个月较去年同期分别多 49.07 万亿元和 23 万亿元。与此同时，前 5 个月家庭住户短期贷款和消费贷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57 万亿元和 4.7 万亿元，疫情之下居民出现“报复性储蓄”。此外，中国居民杠杆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且今年以来快速加杠杆。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 年第一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为 57.7%，较去年底大幅上升 1.9 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加杠杆。一般情况下，当收入未明显增加，债务率和杠杆率上升可能抑制居民消费和社会生产。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2020 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9 万元，实际同比增速-3.9%，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消费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一部分用来投资，一部分用来还房贷或用于其它必须支出，若这些部分占比过大将挤占居民的消费支出。鉴于今年一季度以来居民中长期贷款较去年增多，因此合理推测居民整体贷款负担较去年增加，在可支配收入下滑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居民减少了消费支出。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股市财富效应使得居民部分财富流入股市，居民用于消费的额度相应减少。

最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也影响着居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是居民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消费增加的幅度。2020 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91 元，较去年第四季度略有上升，但同期居民消费环比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居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

● 中国全社会消费全景图

按照中国统计局分类，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为“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2020 年疫情之后商品零售比重上升，餐饮明显下滑：4 月中国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比重大约 91.8：8.2。2019 年 12 月这一比重为 87.56：12.44，表明疫情导致居民外出就餐减少，而主动增加了零售商品消费。

分区域来看，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自新冠肺炎以来发生了细微的变化。2020 年 3 月份以来，城镇和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大约 87%：13%。而在 2019 年底，城镇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 85%：15%。疫情之后城镇居民消费明显好于乡村，表明疫情对农村消费冲击更大。疫情可能加大贫困人口范围，甚至返贫人口增加。

按消费业态，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百货公司、购物中心、专业店、专卖店、便利店等，4 月它们的销售总额同比分别下跌 20.9%、6.7%、9.6%、7.9% 和 3.7%；疫情之下便利店和专卖店销售额同比降幅持续扩大，而超市零售疫情之后仍然保持正增长。网络零售 2020 年 3 月销售额同比增长 4.1%，4 月疫情防控级别逐渐下调之后，网络零售销售额同比有下降为-6.1%。但其它线下消费如百货商店、购物中心和专业店销售额同比降幅大幅收窄，表明后疫情时期，居民消费逐渐将由线上转向线下。

分区域看，全国 32 个省市中，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排名前 10 的分别为：广东（10.61%）、山东（8.9%）、江苏（8.78%）、浙江（6.76%）、河南（5.65%）、湖北（5.03%）、四川（5.01%）、河北（4.46%）、湖南（4.29%）、福建（3.92%）、辽宁（3.73%）、上海（3.36%）、安徽（3.33%）、北京（3.05%）、黑龙江（2.46%）。由于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占主导，因此服务业消费也占据重要地位，零售数据只是消费的一部分，这是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消费品具体分项来看，汽车是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疫情之后受各地汽车相关税费减免措施，以及私人交通需求上升车辆购置需求加大的影响，汽车消费 5 月之后明显回升。汽车消费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2019 年 11 月之前大约 9%左右，2020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比重有所提升，2020 年 3 月和 4 月汽车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9.86%和 10.94%。

为了更进一步考察消费结构，笔者借用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这一指



标。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是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部分。2020年前四个月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33.6%，但鉴于数据可得性，这些基本能够反映中国消费品的部分结构特征。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中，2020年5月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汽车（30.64%）、石油及制品类（13.14%）、粮油、食品类（10.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9.2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6.7%）、日用品类（4.76%）、中西药品类（3.91%）、通讯器材类（3.45%）、烟酒类（2.57%）、化妆品类（2.45%）、文化办公用品类（2.16%）、金银珠宝类（1.84%）、饮料类（1.66%）、建筑及装潢材料类（1.32%）、家具类（1.22%）等。其中，汽车和石油及制品类属于互补品，汽车销量上升必然带来石油及制品需求上升，但今年前四个月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导致石油及相关制品消费额上升幅度不及汽车销售额。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和家具类主要得益于前5个月房地产销售的回暖。

消费的修复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那么当前消费恢复到了什么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自5月份开始同比正式由负转正，意味着消费的修复已正式开始。疫情期间，可选消费类如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金银珠宝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书报杂志、家具及建筑装潢类、汽车以及石油制品类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但自5月开始销售额同比大部分开始由负转正。一些必选消费，如中医药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日用品、烟酒、通讯器材类销售额疫情前后变化不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疫情期间甚至逆势上扬。因新冠肺炎的常态化防控措施，以及第二波和第三波反弹的可能性，居民消费尤其是部分服务业可选消费的恢复进度受到较大影响，这导致消费数据的修复慢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 在线新经济拓展了消费的边界

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多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在线新经济保证了疫情期间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疫情也催生了一批新消费模式和新营销模式，如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买菜、云遛狗等一系列新服务模式应运而生。在线消费从实物拓展到服务，消费模式和消费边界不断拓展。同时“在线带货”等营销模式进一步挖掘了消费的潜力，并拓展了消费的空间。由于疫情目前已经持续超过3个月，人们逐渐适应了新型消费模式。与此同时，新的消费模式使得企业更加重视线上获客能力，线上流量又带来传统业务的迭代和更新，如此良性循环。

消费回暖在其它数据上也得以佐证。中国物流业数据显示，2020年3月之后随着消费需求逐步回暖，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迅速恢复，幅度还远远超过疫情之前：3月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23%，较2月0.21%的同比增速大幅上升；5月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41.1%，是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之后居民线上消费加大了快递业务需求量。从互联网流量来看，2020年2月之后移动互联网接入月户均流量保持在9000MB以上，2020年4月高达9605.12MB，远高于历史最高值。

此外，移动APP流量平台的增加也能反映出在线新消费模式的年龄结构和在线消费的偏好特征。从年龄结构来看，移动APP流量平台主要集中在25-34岁（占



比 29.27%) (注: 2020 年 5 月数据, 数据来源: WIND, 百度。下同)、19-24 岁 (占比 29.26%)、35-44 岁 (占比 29.15%)、45-54 岁 (占比 8.04%)、18 岁以下 (占比 3.25%)。移动 APP 流量消费兴趣主要集中在: 软件应用、影视音乐、资讯、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书籍阅读、游戏、餐饮美食等。

● 发挥消费持久增长动力的技术路线图

一个国家消费能力的提升, 短期受刺激措施影响, 中期取决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长期则取决于技术的升级和迭代。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和地区以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提振当地消费, 还有汽车和家电等行业的税费措施, 短期而言对于释放部分消费潜力影响显著。但中长期来看, 居民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的提升, 而消费能力的提升取决于居民收入, 以及居民获得可持续收入的能力。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拥有 4 亿中等收入阶层, 但相对于 14 亿人口大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壮大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群体, 是发挥消费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重要措施。

首先, 要切实提高居民劳动报酬收入, 多渠道增加包括利息、出租房屋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等在内的财产性收入。

其次, 针对农村消费群体, 应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渠道。继续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农业补贴制度、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同时对贫困人口增加转移性收入。当前国务院强调的“地摊经济”和“夜间经济”有利于消除居民消费的顾虑, 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们是否创造 GDP, 而在于这些非正规经济可以为居民创造收入, 从而提高居民财富和可持续消费能力。

再次, 居民消费升级还需要从供给端入手。3 月 13 日, 国家发改委与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六大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其中四方面的举措是从供给端提升消费潜力。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消费的升级还受制于技术迭代。互联网的兴起和繁荣, 极大的便捷了中国的线上消费, 拓展了线上消费的广度; 得益于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供应链和物流崛起又进一步提高了线上消费的深度。同时, 在线支付的发展为消费升级提供了便捷。因此, 长远来看, 技术创新是消费升级的前提和保障。2020 年“两会”提出两新一重”, 尤其是 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都是从技术层面促进消费升级, 技术的迭代速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升级的进程。本次在新冠肺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线经济, 与多年之前中国积极布局互联网经济是分不开的。最后, 提升消费品质, 发挥工匠精神, 最大做好中国品牌。同时扩大进口,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做好特色品牌的线上线下宣传。

总之, 要保证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除了让居民有钱可花, 有地方花, 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 让居民有钱敢花。

(吴金铎: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法国更换总理背后玄机几何】

法国总统府 7 月 3 日发布公报说，总统马克龙任命让·卡斯泰为总理，负责组建新政府。当天早些时候，卡斯泰的前任菲利普提交政府辞呈并获得批准。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此前就有迹象表明，马克龙有意重组政府，但菲利普辞职之突然、继任者被任命之迅速，还是让法国民众始料未及。如今，深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法国急需重振经济，多项改革也有待推进，此次政局变动能否助推法国政府应对挑战，尚待观察。

● 换人玄机

据民调机构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兢兢业业的菲利普赢得了法国民众的信任，高达 55% 的法国人希望他继续担任总理。然而，多种因素最终决定，当下的高人气不足以留住菲利普。

有分析人士指出，菲利普此次辞职是为法国政府此前的种种施政不力埋单。菲利普 2017 年担任总理后，法国社会矛盾依旧不断累积。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法国政府一度暴露出疏忽大意、对医疗卫生系统重视不足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与总统决策有很大关系，但总理也需要承担责任。

在法国政坛，总统为了提升民意支持率而重组政府是惯常做法。目前，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只有 35% 左右，更换总理、重组政府的做法有利于他向民众展现执政新气象、提升民意支持率。近期，马克龙已多次表示，需要成立一个新政府团队，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和地方重建计划。

菲利普今年 3 月宣布参加北部滨海城市勒阿弗尔的市长选举时，曾透露出他本人将辞去总理职务的态度。6 月底菲利普最终胜选后，法国媒体报道说，菲利普辞职后将前往勒阿弗尔任职。

● 何以是他

菲利普的辞呈刚一获批，55 岁的让·卡斯泰就迅速被任命为新总理，这表



明马克龙对重组政府提前做好了安排。

卡斯泰上位的原因至少有三。首先，卡斯泰今年4月被政府任命为“解禁”专员，负责协调政府在疫情防控措施解禁期间的政策和工作，同时，他也支持马克龙的经济重建计划。法国媒体认为，熟悉解禁工作并支持马克龙主张，是卡斯泰受到马克龙青睐的首要原因。

其次，和菲利普一样，卡斯泰也曾是右翼阵营共和党成员。在法国媒体看来，他当选总理反映出马克龙在接下来的改革中依然需要来自右翼阵营的支持。

此外，卡斯泰长期担任地方市长，有丰富的地方主政经验，这一点也被马克龙看好。

● 面临挑战

卡斯泰7月3日晚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担任总理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国家经济，他深知总理这份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希望将自己和民众密切联系的优势发挥出来。

法国媒体认为，鉴于法国当前形势，卡斯泰领导的新政府接下来将面临多重挑战，压力不小。

法国经济正承受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大批企业破产或裁员，经济发展颓势明显，如何快速有效重建经济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

如何推进包括退休制度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如何设法化解种种社会矛盾，对新政府也是极大的考验。

对于长期主政南方小城市、完全没有部长经验的卡斯泰来说，如何挑选新政府组成人选，如何平衡各方政治势力，也是他必须面对的棘手考题。

[Top](#)

【G7 扩容矛盾加剧韩日紧张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对美国有意扩大七国集团（G7）架构并邀请韩国参加今年峰会表达了反对意见。6月29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不具名高官指责日本习惯于“祸害”周边国家却拒不认错反省，简直“无耻之极”。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反对韩国参与G7峰会，既是担心韩国在国际场合宣传历史问题，也是想维护其G7唯一亚洲成员国的地位，还有借对韩强硬挽救安倍支持率的目的。韩日之前已在历史问题、经贸关系等方面摩擦不断，如今在G7扩容等国际问题上又发生矛盾，令韩日关系愈发紧张。

● 韩国积极回应

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1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欣然接受参加今年G7峰会的邀请。文在寅同意特朗普认为G7体制“已经落后”的说法，并表示G7扩大会议若能召开，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里程碑事件。

对韩国而言，这一邀请无疑是美国伸出的橄榄枝。韩国有望借此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增加其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和领导力，同时也能在全球议题设置上享有更多话语权，在韩日历史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事关韩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赢得更多主动权。



韩国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特朗普邀请韩国参加 G7 峰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措施得力、效果显著。若韩国参会，文在寅将积极向 G7 成员国介绍韩国防控疫情和提振经济的经验和做法，向国际社会传递通过支持多边主义克服危机、恢复经济的信息。

韩国建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培根说，在 G7 多边框架下，韩国能更好地发挥国家软实力，同时在维护半岛和平这一核心议题上也有望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 日本明确反对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6 月 29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最终以怎样的形式召开 G7 峰会，主席国美国正在协调，但日方认为，维持 G7 原有框架是极其重要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日本明确反对韩国加入 G7。

日本共同社分析说，日本政府明确反对韩国加入 G7，或许是对韩国有可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在国际舞台上单方面进行宣传怀有戒心。韩国舆论也认为，韩国如果加入 G7，将增加其在“慰安妇”、被强征劳工索赔等历史问题上的发声机会，使日本面临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压力，这是日本高度警惕的。

韩国舆论还认为，日本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想维护自己是 G7 内亚洲唯一代表的地位。如果韩国借参加峰会之机成功跻身 G7 成员国之列，将削弱日本在 G7 的影响力。日本难以接受同属亚洲国家的韩国在 G7 与自己平起平坐。韩国韩神大学日本学教授河钟文说，日本政界一贯对韩国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不愿接受和承认韩国形象与地位的提高，所以对韩国加入 G7 反应异常敏感。

另外，日本此举还被认为有国内政治考量。河钟文说，安倍目前支持率不断下滑，如果此时轻易缓和其对韩立场，将招致支持他的保守群体的批评。

● 关系继续恶化

近来，韩日两国因劳工索赔以及“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等历史问题引发的矛盾持续发酵，日本对韩贸易出口限制没有松动迹象，此时两国又在 G7 峰会扩容问题上发生龃龉，将不可避免导致本已陷入低谷的韩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韩国 6 月 24 日提名本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参选世界贸易组织新一任总干事。据韩媒报道，日本有意阻挠韩国官员参选。

去年 7 月，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 3 种半导体工业原材料加强审查和管控，此举被韩方认为是日方在历史问题上对韩国的“经济报复”。今年 6 月，韩国再次就日本的出口限制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日方担心，若韩国官员成功就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日方将在韩日贸易争端中处于下风。

有分析指出，目前安倍政府在韩日关系上立场强硬，对话意愿不足，短期内两国矛盾恐进一步加深。由于世贸组织总干事人选和 G7 峰会扩容都需要各成员一致同意，因此日本可能制造阻力，韩国或将采取反击措施。

韩国国立外交院日本研究中心顾问金在信认为，从日方一系列反应看，日本不希望看到韩国在国际舞台的声望提高，现阶段韩国政府应积极游说有关国家，加强外交努力，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

[Top](#)



【欧美分歧呈现“加速度”】

自7月1日起，德国将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欧美分歧日益凸显、矛盾“多点开花”的大背景下，如何定位欧盟与美国这对传统盟友的现实关系，成为“掌舵者”德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欧美之间的矛盾既反映出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对垒，也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冲突。这些矛盾在新冠疫情等问题影响下呈现加速发展势头，或已令欧美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未来，欧洲将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 “严寒”已至

“美欧之间的‘严寒’”——法国《世界报》日前以此为题，刊文描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不断恶化的跨大西洋关系。

过去三年多来，欧美之间龃龉不断。从伊朗核问题到中导条约，从防务开支到“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从气候变化到数字税，欧美这一对传统盟友在安全、经贸和国际治理等方面都出现严重分歧。

近来，双方矛盾似乎更加尖锐。特朗普6月中旬以德国国防预算太低为由，宣布将大幅削减驻德美军人数。德国各界对此严厉批评，称这“不是对待合作伙伴的做法”。对于美国计划扩大对“北溪-2”管道项目制裁一事，德国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指出，美方的制裁将是对欧洲能源安全和欧盟主权的严重干涉。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也令欧美关系雪上加霜。疫情初期，美国曾经截留运往德国和法国的口罩，从当时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擅自运走病毒检测试剂盒，甚至企图将德国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果据为己有……在欧洲急需援助之际，美国不仅隔岸观火，还落井下石，让欧洲盟友们寒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底在阐述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时说：“美国是欧洲的主要伙伴。当然，我知道现在与美国合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从气候变化到贸易政策，以及当前对于国际组织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性，双方都有分歧。”

● “结构性变化”

欧洲方面有观点认为，欧美关系的严重倒退源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政策，如果重视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能在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胜出，欧美关系将很快“回暖”。

不过，许多欧洲政治家不认同这一观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表示，欧洲应该意识到，即使拜登赢得大选，情况也不会回到从前那样。

德国外长马斯也对媒体表示，有人认为民主党人当选美国总统就能让欧美关系恢复如初，这种看法实际上低估了双方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任内，美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都在逐渐卸下国际责任，展现出日益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这让有着多边主义传统的欧洲人无法接受。这种“结构性变化”很难因为一场选举就发生逆转。

● 重新定位



面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欧洲开始重新定位欧美关系并寻找新出路。用默克尔的话说，美国如果不愿承担全球性大国的责任，欧洲将不得不对欧美关系“进行根本性思考”。

默克尔此前已表示，德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会把加强欧盟的国际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作为今年下半年外交方面的主要任务。为此，德国规划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包括计划召开欧盟—非洲峰会和筹备欧盟—中国峰会等。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欧美间嫌隙已深，但并不意味着双方从此就会分道扬镳，因为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多领域依然有诸多共同利益。未来，欧洲会更多关注自身内部的团结，并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扮演更加独立自主的角色。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新基建如何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视频会议，移动办公，电商网购、在线教育、外卖服务、线上文娱等“宅经济”迅速崛起，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消费场景迅速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智能制造、无人配送、线上医疗等新兴产业在战疫中爆发出蓬勃生机，为此，政府相继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商务部大数据监测，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100多位县长、市长走进直播间为当地产品“代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24.1%，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如今，数字经济发展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前所未有。

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数字基建”是真正的新型产业生态，只有做好“数字基建”才能为“数字中国”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才能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持与动力。“数字基建”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主要以5G技术为基础。



只有以 5G 技术为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万物互联、工业互联网、信息化才有实现的可能。”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 5G 领域占据领先地位，5G 不仅是我国优势新兴产业，而且“数字基建”与老百姓生活也息息相关。例如，随着智慧城市的设想得以实现，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更便捷的服务，节约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随着科技与生活的关系越发紧密，科技发展将带动大规模消费。例如，随着智能手机相关技术不断发展，会使国产高科技手机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总而言之，“数字基建”与消费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恰好迎合了国家提出的“消费回补”的政策导向。

一、“数字基建”为何如此重要

目前，5G、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融合、持续渗透，数字资源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分量不亚于工业时代的“石油”。

1、从外部环境来看

我国在芯片、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等领域要想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需要很多年，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逐渐失效。为突破少数发达国家给我国设置的重重关卡和阻碍，我国科技行业必须向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的方向发展，逐渐摆脱“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抢占制高点。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势必会演化为科技竞争，为维护我国的大国地位，发展高科技产业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2、从内部环境来看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传统产业亟需转型升级，现有的经济结构亟需优化调整。为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大科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助推现有的科技企业快速发展，以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带领一批批科技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其所在的细分领域迎头赶上，以迎合新一轮世界经济竞争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要求。

3、从世界历史发展看

几乎每一次重大疫情过后都会出现新的经济形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我国经济加速转型，摆脱对传统经济发展路径与模式的依赖，在线办公、在线教育、信息化医疗、城市智能化管理等产业快速崛起。疫情结束后，政府将在公共卫生、城市管理等领域投入大量资源，提升其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在此形势下，相关行业及企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A 股市场也将迎来众多新的投资机会。

4、从我国经济结构看

过去我国刺激经济发展常用的方法就是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刺激房地产市场。但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这种方法不仅会导致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越陷越深，而且还会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造成极大的制约，导致相关行业与企业错失发展机遇。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巨大流动性，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及各种虚拟市场，资金空转愈演愈烈，社会资源被严重浪费。发展“数字基建”，推动 5G、汽车智能化、新能源汽车、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行业快速发展，不仅可以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还能让金融资本反哺产业经济。

传统基建采取的大多是重资产模式，“数字基建”主要以 5G、大数据、云



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型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对能源、交通、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成为数字时代新的结构性力量，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

二、数字基建如何驱动经济转型升级？

1、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新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一样，都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作为基础与保障。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蒸汽机时代以铁路和运河建设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的电力时代以高速公路、电网建设为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的信息时代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基础。对于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来说，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是重要基础，也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在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是被影响者、追随者乃至追赶者。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我国第一次以原发性国家的身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了抢占战略高地，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获取领先优势，必须迎合当下的国际贸易规则，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土地、资源等基础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为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在投资运营模式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很大的区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覆盖的范围更广，不同领域的基础设施实现了高度融合，参与投资、建设的主体更多，支撑的业态更丰富，对投资模式与运营模式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5G建设不仅需要无线技术与网络技术提供支持，还需要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制造和智慧能源提供支撑。在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传统投资主体、运营主体、建设主体的边界被打破，投资模式、运营模式被颠覆、被创新，创新型企业、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大幅下降，与之相对的产业生态更加丰富。新型基础设施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市政、交通、安全、环境、信息化等，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的集成管理，将在很大程度上颠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现有的管理模式。

3、新基建有助于改善我国投资结构

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走过高峰期，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从短期看，虽然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仍可以拉动内需，但已无法对经济结构优化产生很大的作用，还有可能招致债务风险或金融风险。但是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带动数字经济发展，还能拉动边际效益实现新一轮增长，对优化经济结构、拉动投资都能产生显著效应。从这个层面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就像一个新引擎，可以产生一系列的拉动作用，拉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发展，促使制造业实现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带动新型服务业快速发展，拉动以新材料、新器件、新工艺和新技术为代表的强基工程和以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软件、产业互联网、云平台为代表的新四基发展。当前，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突破，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加快了向数字化转



型的脚步。中国作为世界网络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更加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